**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 杜繼平譯

摘要： 本文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形式。1960年 代末，資本積累的危機造成凱恩斯主義的破產。資產階級力圖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重獲階級統治權。此即：按新自由主義的原則重新改造政府結構，對抗工會權力，向有礙於競爭彈性的所有社會結合的方式進攻，取消社會福利措施或使之倒退， 把公共企業私有化，創造有利於企業的環境以促進國際貿易、大量引進外國投資。新自由主義表明了統治精英建立起對抗工人和社會反抗的階級權力。結果，新自由主義讓統治精英得以恢復階級權力，在刺激經濟增長上卻乏善可陳。新自由主義當道之日，資本積累更帶有剝奪的特點。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生產新的財富。新自由主義有許多內在的衝突，如個人自由與專制傾向之間的衝突，誘人的口惠而實不至的衝突。因此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產生廣泛的反對文化。被主流社會用來應對這些內在矛盾的新保守主義，看來僅是剝除了新自由主義想隱身其中的威權主義的惟幕。最後文章分析應對這些衝突的不同方案，並指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抗擊複雜多樣、無處不在。但一般說來，階級戰鬥是關鍵，自由的要求則是核心。

布希總統再三重申美國送給了伊拉克人民“自由”這份珍貴的禮物。「自由」，他說，「是全能的上帝給全世界每個人的禮物」，「我們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有促進自由擴展的義務。」（註1）政府和軍方反覆提說先制侵入伊拉克的非凡成就已使伊拉克自由，這套官方的禮讚，美國媒體與之唱和者甚眾，許多輿論看來也認為這是繼續支持戰爭的有說服力的說法，雖然官方開戰的理由（如：薩達姆與拉登有關聯，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直接危及美國的安全）已被察覺站不住腳。然而， 自由的字義多詭。如多年前·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言：“自由是匹良駒，但看騎往何處。” （註2）那麼，給這麼慷慨饋贈自由之馬的伊拉克人民被期望騎前往何處呢？

2003年9月19日美國詳答了這個問題，當天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的首腦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發佈了四條指令，其中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部私有化，外國公司有權利掌握伊拉克公司的所有權，外資利潤可全部匯出…外資可控制伊拉克銀行，外國公司的國民待遇，以及…取消幾乎所有的貿易壁壘”。 （註3） 這些指令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媒體、製造業、服務業、交通、金融和建築業。只有石油豁免（推測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特由美國控制的武器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消說，這些指令也觸及勞動市場。禁止罷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到限制。還強加了美國保守派早就夢寐以求的高度累退的“統一稅率”。如克萊因（Naomi Klein）所指出的，這些指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這些公約規定佔領勢力必須保衛被佔領國家的財產而無權出售。（註4）再者，把倫敦《經濟學家》雜誌所稱的 “資本主義夢想” 強加在伊拉克頭上，招致很大的抵制。甚至由美國指派在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任職的臨時貿易部長，也抨擊強加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稱之為“不顧歷史的謬誤邏輯”。（註5）如克萊因也已指出的，伊拉克也許再兩年便可建立的直選民主政體幾乎肯定會拒絕自由市場的改革，美國抵制伊拉克的直接選舉即是想要在民選政府產生之前，與由它指派、奉命唯謹的臨時政府一起把自由市場的改革牢牢固定住，這點幾乎可以肯定。布雷默的指令如由佔領勢力強加，可能會被判定為非法，如經臨時政府（即使非由選舉產生）認可的話，則在國際法下也可被視為合法。2004年6月底接掌政權的臨時政府雖據稱具有“主權”，卻只有認可現存法律的權力。它不能修改現存法律或再訂新法（雖則臨時政府人員也不可能根本偏離布雷默的指令）。依伊拉克的條件爭取伊拉克的選舉自由並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與保護伊拉克資產不受外國掠奪者侵佔的鬥爭顯然是一致的。

一、轉向新自由主義

美國顯然想以主力部隊在伊拉克強加一個徹底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其基本任務就是促進有利於資本積累的條件。布雷默所勾勒的那類措施，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創造財富從而改善全民福祉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融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要義，並已多年主導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立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際，布希總統在《紐約時報》中聲稱，「我們將運用我們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和影響的地位，建立一種有序和開放的國際環境，許多國家能從中滋長進步和自由。一個不斷增加自由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表現美國經久的理想，並團結美國的盟邦…我們在壓迫、憎恨和貧窮被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的地方，謀求公正的和平」，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已證明能讓整個社會脫離貧窮」。他總結說，今天，「人類手中掌握了使自由戰勝它所有的長年宿敵的機會。美國樂於挑起領導這一偉大使命的責任。」同樣的論調出現在不久後出版的《國防戰略報告》序言中。（註6）正是這種被解釋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要強加於伊拉克和全世界。

第一次組成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大實驗是1973年皮諾切特（Pinochet）在智利發動“小型911”政變之後進行的，這距布雷默在伊拉克宣佈建立新自由主義體制大約30年，在此回顧一下，不無裨益。這次推翻·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選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政變，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強大後援和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支持。它用暴力鎮壓了所有的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瓦解了所有形式的人民組織（如窮困住宅區的社區健康中心）。勞動市場從管制或制度性的限制（例如工會權力）中 “自由化”了。但到了1973年，先前拉丁美洲國家試圖復興經濟而盛行的進口替代政策，在1964年軍事政變後的巴西雖有些成效，此時卻已聲名掃地。在世界經濟處於嚴重衰退的情況下，另闢蹊徑的要求就明白提出來了。一群信奉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理論，因而被稱為“芝加哥小兔崽”（ “the Chicago boys”）的美國經濟學家，給召去幫助重建智利的經濟。他們按照自由市場的路線，把公共資產私有化，開放自然資 源給私人勘採，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外國公司從智利分公司匯回利潤的權利獲得了保障。出口導向的增長受到勝過進口替代的偏好。唯一還留給政府經營的 部門是關鍵資源─銅（頗類乎伊拉克的石油）。智利的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隨之復振，外資的投資報酬率也上揚，這為其後撒切 爾夫人主政的英國和雷根當家的美國轉向更加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可資仿效的證據。在世界體系的外圍國家實行的參殘酷實驗成為中心國家形成政策的範例，這並不是第一次（如今非常類似於在伊拉克實驗的統一稅率已有建議提出來了）。（註7）

然而，智利的實驗顯示，經濟增長的利益並沒有好好分配。國家與其統治精英連同外國投資者受惠良多，而人民一般處境不佳。這些經久連續不斷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後果，已足可視為是整個規劃的結構組成部份。達姆尼爾和李維（Dumenil and Levy）甚至認為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個讓人口中最富裕階層重掌階級權力的謀劃。在評論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是怎麼獲利時，他們寫道：

「二戰前，這些家庭的收入得到總收入的16%。戰爭期間這一比例急遽下降，1960年代縮減至8%，就此停滯了30年沒有變動。198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突然躥升，到20世紀末已達15%。觀察總體財富，趨勢也大致雷同...」（註8）

其他資料顯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1978年的2%增加到1999年的超過6%。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現在開始生效，財富向社會上層集中仍持續快速進行。達姆尼爾和李維也注意到，「1970年代的結構危機，由於利率鮮能高過通貨膨脹率，公司發放的紅利低，股市低迷，在那些年中進一步侵蝕了最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財富」。1970年代不僅有全球滯脹危機的特徵，這也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權力受到最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繼續論證說，新自由主義便是針對這一威脅而興起。（註9）

但要證實階級權力復辟回朝這個論點，就得查證出一組特定的階級力量聚集在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後，因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可能訴諸像智利那種暴力而須靠建構共識。我們必須回到1970年代這關鍵的十年，以瞭解這是怎麼做到的。

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和奠定美國資本與勞動的社會協定基礎的凱恩斯主義，在1950和1960年代的高增長時期暢行無礙。在大部份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再分配的政綱、對資本自由流動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的建立，與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和足夠的盈利攜手並進。但到了1960年代末，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經濟，這種好景不再。1973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0PEC石油禁運之前，本來一直規範國際經濟關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瓦解了。一場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的跡象到處顯而易見，開啟了一個全球滯脹和許多國家財政危機的階段（英國在1975-6年須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助才脫出困境，紐約市同年也技術性破產，而政府支出的縮減則幾乎處處可見）。凱恩斯主義的妥協對策顯然失效，不再能讓資本積累與社會民主政綱協調一致了。（註10）

左派的對策是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必要的話，還包括用緊縮財政支出與管制工資、價格來抑制勞工和民眾運動的想望），卻不正面否定資本積累的能力。這個對策是由歐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聯盟提出的，在像意大利北方“紅色博隆納”（ “Red Bologna”）的地方寄望於嘗試以革新的方式駕馭管理資本的積累，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轉向更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思想。在這樣的規畫下，左派號召了相當的民眾力量，在意大利幾近當權，在法國和西班牙則實際已獲得國家政權。即使在美國，1970年代初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制訂了一大串改革法案，由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簽署，來管治環境、勞動、消費者和公民權利的問題。（註11）但左派大體上並沒超出傳統社會民主派的對策多少，而在1970年代中期這些社會民主方案即已證明不能符合資本積累的要求。結果造成兩極對立的爭論，一方是經常採取實用政治策略抑制自己選民的想望的社會民主勢力，另一方則是力謀為勃發的資本積累重建更為開放的環境的所有利益集團。

新自由主義過去早就給備好要用來當成公共政策，處理那些危及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事物，並醫治資本主義的疾病。但只是在陷入困境的1970年代，才登上舞臺中心，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經諸如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會」（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芝加哥大學這些智庫的培育、鼓吹而得勢。新自由主義的兩位要角，哈耶克（von Hayek）與弗里德曼分別於1974年和1976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自由主義也得到了尊崇，逐漸發揮實際的影響力。例如，在卡特總統任內，為處理美國延續整個1970年代的長期滯脹，提出多項對策，其中就有取消經濟管制一項。但要到1979年美國和英國加以採用，新自由主義才大大鞏固，成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管理經濟的新正統政策。

那年5月，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在英國當選首相，獲得有力的授權改革經濟。在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和「經濟事務研究會」的思想影響下，她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凱恩斯主義必須拋棄，改以貨幣學派的「供給面」（“supply-side”）藥方為治療1970年代英國經濟滯脹的根本之道。她明白，這不啻是要實行在財政和社會政策上的革命，毫不遲疑便表示出強烈的決心，要廢除英國自1945年以來確立的社會民主政府的各種制度和政治措施。也就是對抗工會的權力，攻擊有礙於競爭彈性（包括許多專業人員及其協會的權力）的所有形式的社會結合（如藉由市政管理表現者），取消福利國家的措施或使之倒退，把公共事業（包括社會住宅）私有化，減稅，鼓勵企業創新，並創造有利的企業環境以吸引外國投資（特別是日本）大量流入。

皮諾切特用強制的國家暴力做到的事情，撒切爾則以組織民主共識來完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進行革命行動之前，必須先形成共識和思想文化的主導權，而撒切爾確實自稱為革命者，就此而言，葛蘭西的觀點切中肯棨。在1970年代經濟停滯的黯淡時期，針對工會權力與政府官僚顢頇刻板令人氣悶的作風而來的個人主義、擺脫管制、自由作主的思想，在越來越曲意迎合大資本利益的媒體樂於宣傳下，蔚為洶洶巨流，在英國大行其道。資本主義的危機被詮釋成資本主義體系治理失靈的危機。而卡拉漢（Callaghan）領導的工黨政府為得到彌平長期債務的貸款，1976年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下，同意實施遵循企業路線卻違反傳統支持者利益的緊縮財政支出計劃，也有助於為撒切爾所說的思想掃除障礙，即：捨新自由主義方案“別無他途”（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識的形成，特別是在中產階級內部，使撒切爾的選舉獲勝，撒切爾革命就這樣做好了準備。按照規劃，她握有選舉的授權去削減工會權力。但要對付在教育、醫療保健和市政管理等領域有很大權力的專業人員協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的內閣（及支持者）在這點上分裂，鬧得沸沸揚揚，黨內和媒體為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內涵吵得不可開交，大傷和氣，費了好幾 年工夫才弄清楚。後來她有一段著名的談話說：“沒有所謂社會這種玩意兒，只有個人”，隨後她補充說，“以及他們的家庭”。所有社會結合團結的形式都要打散，以利於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個人責任以及家庭價值。意識形態的攻擊根據撒切爾的說辭所表露出的路線，持續不懈地進行，大體上最終奏效。（註12）“經濟是方法”，她說，“但目標是改變靈魂”。她的確改變了靈魂，雖然所用的方法絕非沒有政治代價，也絕非沒有我們後面會看到的相互矛盾的衝力。

1979年10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保羅•弗克爾（Paul Volcker）讓美國的貨幣政策有了嚴酷的轉變。（註13）美國長期遵行的「新政」原則，大體依據凱恩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充分就業為主要目標，此時給丟棄了，為的是要有利於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卻不管這種政策對就業會有什麼影響，也不管對高度依賴美國經濟條件並對美國利率變動敏感的經濟體（如墨西哥和巴西) 會造成什麼後果。在1970年代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至兩位數的時期，經常為負的實際利率，在聯邦儲備銀行的政令下轉而為正。名義利率一夜之間提高至近20%（這一舉措後來以 “週末夜特價品”著稱），這是刻意讓美國和世界其他許多經濟體陷入衰退和失業。這個政策轉變據云是擺脫滯脹危機的不二法門，整個1970年代美國和全球多數經濟體的特徵就是滯脹危機。

這種此後名為「弗克爾震盪」的做法，若沒有政府政策在所有其他方面並行的轉變是無法鞏固的。朗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選贏卡特具有關鍵作用。雷根的顧問相信弗克爾的“處方” 是對病懨懨的停滯經濟對症下藥。弗克爾獲得支持，再被任命為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雷根政府的任務就是以進一步解除管制、減稅、削減預算和攻擊工會、專業人員的社團來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雷根氣勢汹汹地鎮壓了空運管理人員工會組織（PATCO）一場長期而艱苦的罷工。這表示對有組織的勞工勢力發動全面進攻，而時機正當弗克爾政策引起的衰退造成10%或以上的高失業率之際。但PATCO不是普通工會，它也是個具有專業技術工人協會性質的白領工會，因而毋寧說是個中產階級而非勞動階級工會的標誌。這對勞動條件的全面影響頗為嚴重，也許最能說明情況的是這個事實：1980年的聯邦最低工資與貧困線齊一，到了1990年則比貧困線還低30%。雷根任命主管環境管制、職業安全和健康醫療等問題的官員把反對大政府的運動推到更高的水平。從航空、電子通訊到金融，每一方面的解除管制都為強大的公司利益集團打開了不受束縛的市場自由的新領域。市場被以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描述成促進競爭和創新的重要方法，實際上卻成了鞏固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勢力作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工具。對富人減稅同時也促動了朝向加劇社會不平等和上層階級權力復辟的重大轉變。

1984年，多年報導華盛頓事務的記者湯瑪斯•艾德索（Thomas Edsall）發表了一份預見到上述所有變化背後的階級力量的報告：

“在1970年代，企業界加強了以一個階級來行動的能力，潛藏起競爭的本能，以利於在立法上聯合協作。企業界政治戰略的主題不再是個別公司僅追求本身的特殊利益，而是在擊敗諸如消費者保護和勞動法改革等法案上，在通過有利的稅收、管制和反托拉斯立法上共蒙其利。”（註14）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企業界需要一個階級的政治工具和民眾基礎。因此他們力求掌握共和黨來充當自己的工具。成立強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獲得古 諺所云的「金錢能收買的最好政府」，是一個重要的步驟。1974年通過的資助競選活動的相關法律，被誤認為是「進步」的，實際上是使政治活動的金錢腐敗合法化。此後政治行動委員會確保了兩大政黨在財務上受公司與有錢的專業協會利益集團的控制。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1974年有89個，到1982年大增至1467個。若他們的利益得到滿足，這些政治行動委員會樂意資助兩黨中在位的當權者，但他們也有意地傾向於支持那些右翼的競選者。法律規定每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對每個候選人的獻金不得超過5000美元，這迫使不同公司和不同行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合作：意即根據階級利益建立聯盟。在這段時期，共和黨願意成為「支配階級的選民」的代表，而與民主黨「意識形態上不明確的態度」形成對比，民主黨的這種態度源於「它與社會中各種團體的聯繫是分散的，而婦女、黑人、勞工、老年人、西班牙裔人、城市政治組織，這些團體沒有那個明顯地比其他團體大。」再者，民主黨人依賴“大筆”獻金使得許多黨員極易受企業利益的直接影響。（註15）國內製造業、採礦業、林木業和農業公司在當時展開的階級戰爭中居領導地位。

然而，共和黨如果要有效地拓展權力，需要一個穩固的選民基礎。大約在此時，共和黨人尋求與基督教右派的“道德多數”結成聯盟。它訴諸白人工人階級的文化民族主義與纏繞著他們的道德正當感（被纏繞的原因是，這個階級生活在長期經濟無保障的條件下，又感覺無福享受許多〔照顧被歧視者的〕積極行動及其它政府計畫所分配的利益）。這種“道德多數”可用暗示的種族歧視、厭惡同性戀情緒以及反女權運動加以動員，若不便直接露骨表現的話。在歷史上，一個社會群體出於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原因而投票反對本身物質的、經濟的和階級的利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從那時起，大公司與保守基督徒之間的不神聖的聯盟穩定地鞏固起來，最終把1960年代還很重要且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分子從共和黨中全部清除出去，將共和黨轉變成當今比較同質的右翼選舉勢力。

稍早前貨幣學派轉向了新自由主義，但徒此不足為功，還必須有政治上的轉向來支持，雷根的當選啟動了鞏固政治轉向的長期過程。當時艾德索指出，雷根的政策集中在：

“從範圍和項目，全面減少聯邦政府對產業、環境、職場、醫療保健和買賣雙方關係的管制。雷根政府用以下的手法完成推動解除管制的工作：大幅削減預算降低政府執行管制的能力；任命反對管制、著眼產業發展的官員；最後，賦予白宮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前所未有的權力來推遲實施主要的管制法規、大幅修改管制的建議案，還以長期的成本收益分析有效否決多方面的管制創議。”（註16）

然而，同時另有一項轉變也驅動著走向新自由主義對策的運動，不過這回的轉變卻發生在1970年代的全球層次上。1973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實施石油禁運，OPEC的石油價格飆升，像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布達比這些石油生產國便握有了龐大的金融權力。我們現在從英國的情報報告知道，1973年美國曾積極準備入侵這些國家以恢復石油的流動並壓低石油價格。我們也知道，那時沙烏地阿拉伯人若不是受到美國的公開威脅，據推測也是在軍事壓力下，同意把他們的所有石油美元經由紐約的投資銀行循環回流。（註17）紐約的投資銀行突然發覺他們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資金，必須尋找獲利的出處。197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衰退，投資回報率低，沒什麼好的投資選項，得到國外尋找更有利的投資機會。但要美國控制的資金能在外國及國際間運營，就必須要求外國開放門戶並提供適度的保障條件。紐約的投資銀行為獲取新開放的投資機會、保護國外的交易活動，便想求諸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

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已發展有年，且在很大程度上自命有別於英國、法國、荷蘭以及其他歐洲強權的帝國主義傳統。（註18）美國雖在19世紀末也玩票式地搞點殖民征服，但在20世紀它發展出一個沒有殖民地的比較開放的帝國主義體系。1920年代和30年代，美國在尼加拉瓜搞出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標準模式，當時美國派遣海軍陸戰隊至尼加拉瓜保護美國的利益，卻深陷由桑地諾（Sandino）領導的的游擊抗戰，久拖難決。脫困的對策是找出一個當地的強人——此即蘇莫查（Somoza），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給他、他的家族和現有的盟友，讓他們得以鎮壓或收買反對派，並為自己積累相當大的財富和權力。蘇莫查等人則報以始終支持美國（必要時還促進）在尼加拉瓜和整個中美洲地區的利益。二戰後美國堅持要歐洲強權放棄在全球的殖民統治，自己則採取尼加拉瓜模式維持帝國主義的體系。例如，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伊朗策劃政變推翻了民主選出的莫薩德克（Mossadeq）政府，扶植伊朗國王復辟，伊朗國王給了美國公司開採石油的合同，卻沒有歸還被莫薩德克收歸國有的英國公司的財產。伊朗國王也成了保衛美國在中東石油地區利益的重要人物。在戰後時期，美國用這種手法得以控制許多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國家。但這也讓美國經常必須採取反民主（特別是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的戰略。這有個走向反面的效應，美國越來越和發展中國家的高壓軍事獨裁政權與威權政府結盟（當然，最顯而易見的是在整個拉丁美洲）。結果，美國的利益在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變得更易受損，而不是相反。支持更為高壓的政權總有適得其反的危險。雖然很輕易便可收買到統治精英的附和，但要對抗人民或社會民主的運動就必須採取強制力，於是美國就與大多暗地使用暴力反對民眾運動的長期歷史脫不開關係。

經由紐約的投資銀行循環回流的盈餘資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分散到世界各地。到現在為止，戰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美國投資大多為直接投資，主要與利用開發原料資源（石油、礦產、農產品）或培育特定市場（如電訊等）有關。紐約的投資銀行在國際上向來活躍，1973年後雖然比較不再集中在直接投資，但更加生龍活虎。（註19）這就必須要讓國際信貸和金融市場自由化，美國幾乎在「弗克爾震盪」後便立即積極推進支持這種個策略。紐約的投資銀行起初集中於直接貸款給外國政府。渴求信貸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被誘入了債務/信貸陷阱，有美國帝國權勢支持的投資銀行藉此得以要求比國內更有利的收益率。（註20）由於貸款指定要以美元給付，只要美國利率溫和上升（更別提高漲）就輕易能讓外匯短缺的弱國還不了債務。這時紐約的投資銀行便大有蒙受損失的風險。「弗克爾震盪」沒一會兒，就首次出現了這樣的重大實例，墨西哥受美國利率飆升的衝擊，在1982─-4年間幾近付不出債款。雷根政府上台的第一年曾認真考慮過不再支持「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這時則想出結合美國財政部和IMF的力量的方法，允許債務國借新債還舊債，但要求債務國必須實行經濟結構改革，冀此解決這個難題。當然，這必須要IMF從凱恩斯主義轉向貨幣主義的理論框架，這種轉變很快便完成，IMF成了經濟理論中的新正統──貨幣主義發揮全球影響力的中心。墨西哥在獲准重新安排債務償還方式下，被要求實行制度改革，如削減福利開支，放鬆勞工法令，進行私有化，這些步驟日後謂之“結構調整”。於是在日益加長的新自由主義政權行列中，墨西哥也部分地給擺了進去，從此，IMF成了在世界各地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關鍵工具，有許多情況還用強制的手法。（註21）

墨西哥的實例說明了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在自由主義下，貸款人要承受不良投資決定的損失，而在新自由主義下，借款人卻被國家和國際勢力強迫全部承受償還債務的代價，不論這對當地人民的生計和福祉會有什麼影響。如果償債的安排要求把資產按火災後的倖存品價格廉價交給外國公司，那也得幹。金融市場在全球範圍的這些變革，使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基本上完備了。如達姆尼爾和李維所言，結果是讓美國的上層階級從世界其他地區汲取很高的收益率。（註22）

美國階級權力的復辟也依階級權力本身重組其構成的形態而定。所有者與經營者（或說賺取紅利和利息的貨幣資本與想從組織生產中獲取企業利潤的生產/製造資本）之間的分離多次造成資產階級內部金主與生產者之間的衝突。例如，在英國，政府政策長期主要迎合倫敦市金融家的要求，經常損及製造業的利益，1960年代美國也經常浮現金融家與製造業主之間的衝突。1970年代許多這類衝突消失了。大公司即使仍從事生產，也越來越注重金融領域，如汽車部門便是這樣。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用發配股票選擇權給經營者當報酬的方式交融起來。股票價值而非生產成了經濟活動的指示燈，由此滋生的投機誘惑也就變成勢不可當了，這點在日後如恩榮（Enron）之類的公司破產後，即顯而易見。普遍的結果就是金融界（會計師而非工程師的權力）在統治階級和統治精英內部佔了上風。簡言之，新自由主義也就是一切事物的金融化，以及損害其他部門資本的利益將資本積累的權力中心轉到所有者及其金融機構。因此，支持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整合就成了日益主導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義政權集團（如七大國G7）最主要的關注所在。

二、以概念類型（ideal type）考察新自由主義政權

且拿新自由主義政權當成概念類型加以考察。用概念類型來建構論證有眾所周知的危險，但在初步探討新保守主義的政權是徹底背離新自由主義政權或者僅是以其他方法加以延續的問題時，使用概念類型卻有利於釐清新自由主義政權和前此的社會民主政權的不同之處。

新自由主義政權的根本任務就是從基礎上創造一個“良好的商業氣氛”，從而使資本積累有最佳的條件，不論這對就業或社會福利會有什麼後果。這和社會民主的政權大相逕庭，社會民主的政權是在維持適當而穩定的資本積累率的條件下，致力於所有公民的充分就業和最大福利。

新自由主義政權設法促進所有企業團體的事業，用免稅和其他優惠並在必要時以國家支出提供基礎設施來加惠和激勵企業團體，力言這將促進增長和創新，是消除貧困且終究會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新自由主義政權尤其孜孜於國家資產的私有化，以此為資本積累開疆闢土。以前由政府經營或管理的部門（運輸、電訊、石油及其他自然資源、公用事業、社會住宅、教育）均被轉交到私人領域或取消管制。資本在部門間和地區間的自由流動被視為恢復利潤率的關鍵，凡有礙於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如計畫控制）都必須徹除，除了那些攸關 “國家利益”的領域（但所謂“國家利益”可依需要改變定義）。因此，新自由主義政權的口號就是“彈性”（勞動市場和投資資本的配置）。它大吹競爭好處的法螺，實際上卻把市場開放給集中的資本和壟斷的勢力。

在國內，新自由主義的政權對限制資本積累的社會團體（如工會或其他在社會民主政權下佔有相當勢力的社會運動）無不敵視，在有些情況下還公然鎮壓。它撤消提供福利，在醫療保健、公共教育以及社會民主政權列為中心事務的各類社會服務方面，盡量降低政府的作用。社會安全網給減至無可再減。這當然不是說一概撤除管制行動或政府干預。為了確保無法私有化的公共部門 能“負責”和具“成本效益”，由官員管理這些部門的規章大量制訂出來（例如，撒切爾力求而且也達成了強力管控英國的大學）。公共部門承擔所有風險而公司部門獲取一切利潤的公私合夥關係受到青睞。企業界參與立法和決定公共政策以圖利本身。如有必要，國家還會訴諸制訂強制鎮壓的法令和實行監管的策略（如反勞工圍廠抗爭的法規）以驅散和鎮壓集體形式的反抗。監視和督管的形式大為增加，在美國，關押成了處理被解雇工人和邊緣人口滋生的問題的主要國家戰略。

對國外，新自由主義政權力求減少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也力求對資本積累的全球勢力打開商品和貨幣資本的市場，這些得以進入當地市場的勢力有時是競爭性的資本，但經常是壟斷資本（雖然開放市場的規定總會附上“違反國家利益”者不得進入的條款）。在國外打開獲利高的新地盤（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活動）時，為了堵住國內反對派的口，所謂提高國際競爭的能力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就給抬了出來。在這方面，大公司的資本家集團也照樣與政府權力一起制定政策，合力安排創造像「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國際清算銀行」這類新的國際機構。

新自由主義政權尤其關切金融機構。它不僅設法助其擴張影響力，而且不惜任何代價確保金融體系的完好無損和清償能力。國家權力給用來解救或防止金融破產（如1987-8年的美國儲貸危機與1997-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三萬億美元的暴跌）。國際上它用IMF之類的機構避免讓投資銀行有要不回債務之虞，實際上盡其所能使金融界在國際市場上免遭風險和不確定的局面。新自由主義政權致力於保護金融界，既促成也表現了資產階級的權力在金融化過程中的鞏固。一旦保全金融體系與人民福祉發生了衝突，新自由主義政權會選擇前者。

最後，新自由主義政權是極其反民主的，雖則它經常設法掩蓋這個事實。精英統治受到支持，以前的決策主要是以民主的方式，由議會討論定案，在新自由主義政權下，則捨此而強烈偏好以行政命令和司法判決實行管治。代議制民主尚殘留下來的部份，如果不是像在美國那樣被金錢的威力藉政治獻金法完全敗壞掉的話，也抵擋不了金錢的優勢，被壓得奄奄一息。強有力的機構如：國內的中央銀行（像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準政府機構和國際上的IMF和WTO，給建立了起來，這些機構完全不受民主力量的影響、審計、究責和控制。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大眾民主等於“暴民統治”，往往造成資本積累的所有障礙，這在1970年代危及上層階級的權力。新自由主義者鍾意的管治方式是“公私合夥”，政權和主要的商業集團緊密合作，就促進資本積累的目標協調彼此的行動。結果，被管理者得以制定管理規則，而所謂的“公共”決策則變得更為隱諱難明。

新自由主義政權強調個人和個體的自由、不受管制和責任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市場方面。因而就以個人是否具有創業的才幹來解釋在社會上的成敗，而不是溯因至資本主義特有的階級排斥這類體系的特性。在新自由主義政權統治下出現的反抗言行往往局限於個體人權的問題，結果，大約自1980年始，“激進”的政治觀點和反對派的政見紛紛以個體的人權為主要著眼點，各式各樣的“權利論述”花繁葉茂，粲然大備。遇有問題就得由個體（individuals）（回想一下，公司在法律上也被界定為個體）訴諸法院謀求解決和補救之道。名義上，人人有平等的權利向法院申告，但實際上不論是個人為過失行為興訟，還是一個國家控告美國違反WTO規則，訴訟費用都極為昂貴（打WTO的官司，費用可達一百萬美元，等於一些小的窮國的一年預算），於是訴訟結果就會對握有財勢的人極度有利。無論如何，在司法體系的判決中，階級偏見即使不是必不可免，也是所在多有的。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為爭取多種不同的權利而採取的重大集體行動的方式，是由非經選舉（許多情況下是精英領導）的倡導團體規劃並闡述的，對這點絲毫不必驚訝。非政府組織（NGO）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大量發展，讓人產生幻覺，以為在國家機器之外的一些所謂“公民社會”的分立團體內動員起來的反對行動，是反抗的政治鬥爭和社會改造的強大動力。

從上述的說明，我們清楚知道，國家政權或法院之類的特定政權機構，並沒有如近幾年右派和左派的許多論客所言，因新自由主義而變得無關緊要。然而，政權的機構與行事常規確有根本的改變，特別是在強迫與贊同之間的平衡，資本勢力與民眾運動力量之間的平衡，行政及司法權力與議會民主權力之間的平衡這幾個方面。

以上的“概念類型”說明有太濃厚的功能論色彩。因此考察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基本結構矛盾，以使論述完整而全面是很重要的。支配的階級關係的再生產是社會秩序的基本要件，深植在這種關係中的威權體制與個體自由的理想扞格不合。雖然保持金融體系的完好無損可能至關緊要，但金融體系內部的經營者只圖私利、不住橫流的個人主義卻造成投機的劇烈波動和長期的不穩定。競爭的優點給吹得神乎其神，事實卻是一小撮資本集中的跨國公司的壟斷權力日益鞏固。然而，在民眾方面，強烈要求個人自由的欲望極為容易脫韁失控，造成社會分崩離析。因此，為了永保支配的權力關係就必然要建立可制止要求個人自由的衝勁的壓迫關係。在國際對抗的舞台，由於新自由主義強調競爭而造成的形勢變幻難測，危及霸權的穩定和地位。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就可能因此採取壓制措施和行動，以護衛使其霸權得以存在的不對稱經濟關係。在這些矛盾之外，我們還必須加上一種可能性：新自由主義公開宣告的目標——所有人的福祉與實際後果——階級權力的復辟之間的落差迅速擴大。

後面我們會討論這些矛盾的因素。但顯然，新自由主義必須視為一個不穩定且在演變中的資本積累體制，而非一個已固定下來、功能協調發展的政治經濟權力的組合體。這樣就便於把新保守主義看成對新自由主義固有矛盾的可能反應。

三、植入、擴散與演變

接著考察1970年代中期以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和政策實際上紮根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環境的方式。顯然，英國和美國帶頭領路。但在英國與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都不是沒有問題的。在英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改革歷經長達十年的階級對抗和鬥爭方克有成，1984-5年長期而艱苦的礦工罷工是階級鬥爭的中心主題。撒切爾雖順利把社會住宅和公共事業私有化，但國家醫療保健體系和公共教育這類核心的公共服務部門卻除了在邊緣小敲小打外，沒有傷筋動骨。而由於她自己黨內有許多人一開始並不贊同她選擇的方向，什麼障礙都給丟出來阻擋她實現目標。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the Falklands/Malvinas war）發生時她大肆鼓動民族主義，1983年她獲得連任，得益於民族主義的高漲者，遠過她沿新自由主義道路取得的任何真正成功。在美國，雷根年代的轉軌衝突較少，而且更為重要。196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妥協”政策不可與歐洲社會民主政權的成就同日而語，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也沒那麼鬥志昂揚。雷根也極度專注於冷戰，發動了一場軍備競賽，這場軍備競賽造成某種由財政赤字挹注的軍事凱恩斯主義，給了他在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數選民特有的利益。上升的聯邦赤字則為削除社會福利方案提供了方便的藉口。（註23）

儘管大吹特吹新自由主義是治療病魔纏身的經濟的靈丹妙藥，但不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1980年代的經濟表現都不佳，這表示新自由主義大有可能不是合乎資本家祈求的對策。的確，通貨膨脹降低了，利率也下降了，但這都是用高失業率（例如，在雷根年代裏平均7.5%）換來的。另一方面，法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聯手企圖以銀行國有化加強政府控制和用佔有國內市場來促進經濟增長，並未如願，也表明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任何左派的替代方案亦無可指望。那麼，合宜的選擇方案又在何方？

實際上1980年代全球經濟中最強有力的是日本、東亞“虎”經濟體和西德。這些國家雖與新自由主義在制度上有根本的不同，卻有很好的經濟成就，這樣就很難鼓吹說只要全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便是緩解經濟沉疴明顯可見的藥方，更甭提想強制實行新自由主義了。確實，日本與西德的中央銀行一般都遵循貨幣學派的路線（西德的聯邦銀行尤其戮力對抗通貨膨脹）。但西德的工會仍很強大，工資水準也比較高。影響之一就是刺激了高度的技術創新，讓西德在這方面得以在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出口導向的增長推動西德前進成為全球龍頭。在日本，獨立的工會不是軟弱無力便是根本不存在，但政府投資於技術和組織的變革，公司與金融機構的關係又密切（這點在西德也有合宜的安排）遂造成驚人的出口導向增長的表現，其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如英國和美國卻為此受害不小。（註24）1980年代世界總體的增長率甚至還低於困難重重的70年代，像德、日這樣的增長並不依靠新自由主義。到1980年代末，那些明顯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看來仍未脫經濟困境。很難不下結論說：西德和日本的積累“體制”堪為效法的榜樣。許多歐洲國家因此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朝向西德模式前進（有些相當成功）之際，越來越能找出保留他們的許多社會民主遺產的辦法。（註25）在亞洲，日本模式在威權統治體制下（這種體制是新自由主義更為普遍存在的隱而不顯的特點之一）植入南韓、臺灣和新加坡 ，也證明是可行的，且不失過得去的平等分配。但從階級權力復辟的立場來看，西德和日本模式有一個方面是不成功的。1980年代期間，在英國，尤其是在美國，快速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在其他地區受到了遏制。如果旨在把階級權力交回給上層精英，新自由主義很清楚便是良策。但新自由主義既未能刺激真正的經濟增長，怎麼在全世界達到這個目的，就成了問題。

在這點上，達姆尼爾和李維的論述以及布倫納爾（R. Brenner）、高溫（P. Gowan）和波林（R. Pollin）的補充提供了許多必要的證據。我從中萃取三點獨特的要義。（註26）第一，1970年代開始的金融化轉向，在1990年代加速進行。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快速滋長。金融市場經歷了一波強大的創新浪潮，成為更加重要的協調工具。在198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公司與銀行之間特有的緊密聯結曾對兩國的經濟大有助益，這種緊密聯結此時卻受到削弱。 日本的土地與房地產市場崩盤引發了經濟恐慌，銀行部門也處於危險狀態。德國的急促統一造成了壓力，早先德國人掌握的的技術優勢不再，那兒的社會民主傳統遂不能不備受質疑。但德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並未減其強勁力道，近至2004年，取消政府養老金和免費高等教育這類社會民主成果的企圖，仍遭未竟的戰鬥力抗。第二，在克林頓時代支配經濟政策的華爾街/IMF/財政部複合體，不僅能勸服、誘騙而且還藉由結構調整方案強制發展中國家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美國也用優先進入巨大的美國消費市場的胡蘿蔔，說服許多國家遵循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革他們的經濟，特別是向美國的金融資本開放他們的資本市場。這些政策使美國1990年代的經濟快速擴張。美國當時靠給付較低的工資才達到充分就業，正如波林所論證的，大部份人的福利就算沒有淨損失，實際上也沒怎麼改善（註27），即使如此，美國卻看似已獲良方，它的政策恍若值得仿效。美國勞動市場的彈性化開始奏效，對盛行於歐洲和日本的較為僵硬的體制造成競爭的壓力。然而，美國成就的真正內情卻是：它現在能夠從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中汲取高度的收益率，再匯回美國。美國1990年代的富裕大多得益於這股由全球各地源源而至的貢賦。第三，新取得經濟學正統地位的貨幣學派理論向全球擴散，也發揮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作用。早在1982年，凱恩斯經濟學就已從「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界銀行」的權力決策核心給清除掉了。而到了1980年代末，幫助訓練世界大部份經濟學者的大多數美國研究大學的經濟學系所也都淪為與貨幣學派大體一致的論點。

所有這些方面的因素匯集成威猛的意識形態攻勢，產生了1990年代中期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註28）於是乎，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和英國模式就給說成是解決全球問題的對策，連日本和歐洲（更別提世界其他地區了）也因而受到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道路的極大壓力。諷刺的是，正是中左派的克林頓和布萊爾在國內和國際上對鞏固新自由主義的作用居功最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形是世界制度改革的頂點。按照規劃，WTO為全球經濟的貿易投資設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和規則。但它的主要目標卻是為資本的流動掃除障礙，極力打開盡可能大的世界市場（雖然總會附上保護關鍵“國家利益”的限制條款），因為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金融勢力得以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貢賦便有賴於此。

以上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不同地區的不平衡發展的概要敘述表明，新自由主義的植入同樣也是經營方式多樣變化、創新以及國家、地區（有些情況甚至是大都市）在治理與經濟發展模式上競爭（有時是壟斷型競爭）的結果，而不能單單歸因於像美國這樣的某個霸權強加某種正統模式。簡要考察一下中國的怪異情況，最能說明此言不虛。

四、中國的特異情況

1978年12月，鄧小平掛帥的中國領導階層面臨毛澤東死後政局不定和數年經濟停滯的雙重困難，宣佈了經濟改革方案，恰與英國和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同歸一途，這很難不看成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偶合事件。其結果就是在中國出現了與專制集權統治交錯結合的特殊類型的新自由主義。但對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地方來說——最明顯的是南韓、臺灣、新加坡 ——專制統治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結合已確立有年。就如早已形成重大影響先例的智利所顯示的，專制體制與新自由主義彼此決非無法相容。

鄧小平雖未放棄以平等為中國的長遠目標，卻力主為了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必須解放個人和地方的主動創發精神。循此邏輯而來的題中應有之義，即必然隨之而至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給視為理所當然應該容忍的事。鄧小平在小康（一個讓全民過上好日子的理想社會的概念）的口號下，集中全力搞農 業、工業、教育、科學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譯按：四個現代化”應為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改革力求在中國經濟內部施加市場力量的壓力，想藉此激發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從而希望促進創新和增長。市場定價機制雖經採用，但可能遠不如快速下放政治經濟權力給地方省市來得重要。此外，中國還開放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雖然極為有限且在政府嚴格監管下），因此而結束了中國與世界市場的隔絕。對外開放的一個目的就是獲得技術轉移，另一個目的則是要得到足夠的外匯儲備以購買必要的設備，支持具有更強大的內部動力的經濟增長。（註29）

如果在世界場域內沒有先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為中國大張旗鼓進入和納入世界市場打開空間的話，中國經濟就不會走上後來不同尋常的演變道路，也不會達到已有的成就。因此，中國之得以崛起為一個全球經濟勢力，有一部分必須被視為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意外結果。

這麼說絕未輕忽中國本身內部改革運動的曲折道路的意義。中國人尤其必須瞭解的是，如果沒有階級關係、私有產權的相應轉變以及其他通常為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奠立基礎的所有制度安排，市場對改造經濟形態其實並無多大作用。沿著這條道路的演變既緩慢又經常有各種矛盾對立和危機。這點在1980年代便顯現出來，例如中國出色的增長率大部分是由在中央控制的政府部門之外促動的，而不是如中國人所希望的，用市場改革和更為靈活的市場定價機制提高依官僚結構組織起來的政府部門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來帶動經濟增長率。即使在工商管理方式和政治控制以及獲得政府管制的信貸上，國有企業比許多由地方創辦的鄉鎮企業和本地私人資本享有大得多的優惠，也依然如此。但既然增長的動力源於地方或私人部門，而非中央政府部門，那麼要持續增長就需要且最終也會要求進一步的權力下放和私有化。與此相應的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受到令人矚目的鎮壓中達到頂點，這表示相應於要求進一步經濟自由化的壓力，在政治領域裏也有巨大的矛盾對立。

對1989年事件的反應是發起新一波的經濟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把中國推向更接近正統的新自由主義。汪暉將之概括如下：

「貨幣政策成為主要的調控手段；大幅度調整外匯牌價，匯率接近統一，從而促進了出口，對外貿易形成了競爭和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雙軌制”的差價縮小；上海浦東地區全面開放，各地開發區紛紛上馬。」（註30）

然而，第一波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際遇非常不同。外資起初被引入南方沿海地區的四個經濟特區（這些地區接近香港被認為是有利之處）。這些特區的「最初目標是生產出口商品賺取外匯。它們也充當觀察外國技術和管理方法的社會經濟實驗室。他們提供外國投資者一系列獎勵措施，包括：免稅，及早匯出利潤和更好的基礎設施。」後來中國政府為吸引各類外資還指定了幾個“沿海開放城市”和 “經濟開發區”。但外國公司在汽車和製成品這類領域，想佔有中國市場的企圖一開始沒能成功。福特的合資公司差點生存不下去，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公司在1990年代初便鎩羽而歸。只有出口勞力密集商品的部門才在初期頗有斬獲。1990年代初進入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三分之二以上（在得以生存的企業中所佔的比例更高）由海外華人所組織（特別是香港，但也有臺灣的）。中國對對資本主義企業在法律上的保護薄弱，促使非正式的當地關係和可靠的人脈顯得重要，海外華人在運用人際關係方面佔有優勢。（註31）

1997-8年製造業部門的鄉鎮企業大量破產，殃及許多在主要中心城市的國有企業，結果這成了個轉捩點。原本中國經濟的改造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下放權力給地區、出口區和地方來驅動的，此後則由價格機制與競爭取而代之。結果許多政府經營管理的部門即使不是遭到摧毀，也嚴重受創，造成了廣大的失業浪潮。工人群起抗爭的報導時有所聞，中國政府若想維持不墜，就必須面對吸收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問題。（註32）1998年以來，中國一直力圖用發行國債投資大型項目，改建基礎設施來處理這個問題。他們正計畫推動一個遠比已經很大的三峽工程更具雄圖的南水北調項目，引長江之水入黃河，至少耗資600億美元。自1992年以來，至少42個城市的人口已擴大到逾百萬之數，城市化的速度這樣驚人，就不能不大量投資固定資本。在主要城市正建設新的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還規劃建設8500英里新鐵路，把內地和經濟勃發的沿海地區連成一片，包括上海與北京間的高速鐵路以及通往西藏的鐵路。奧林匹克運動會推動了在北京的重大投資。上述建設投資的總體規模遠遠大於美國在1950與60年代建設的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有可能吸收未來幾年的剩餘資本。然而，這是運用正統凱恩斯理論的赤字融資方式，具有高度風險，因為如果這些投資不能適時獲利再投入積累過程中，政府的財政危機很快就會使中國遭受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後果。（註33）

但是1997-8年的危機也為私人（特別是外國）資本在不用承擔退休金和福利權利等社會責任下接管破產的國有企業，開了方便之門。在1990年代，近5000萬國有部門的職工下崗，農村則有日益增加的1億5千萬待業的勞動者可用，中國的勞動力大量剩餘，加以容易取得政府支持的信貸，這時外資（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的資本，但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亦然）就更便於按照己意改組許多中國的製造業部門。到200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40%以上源於境外直接投資。從那時起，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在發展中國家居首位，早在2004年即廣被預測會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FDI接受國。（註34）對中國市場有興趣的跨國公司此時已能趁機獲利。例如在1990年代早期投資失利的通用汽車（GM）公司，1990年代末又重進中國市場，據報導， 2003年在中國的投資獲利遠高於在美國國內的公司。（註35）外來的投資者雖然在技術上不如當時已缺乏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但根據許多報導所云，比起本地私人部門實際上仍佔有優勢，本地私人部門在一些重大項目還不准投資，而且要為政府幹部和政府控制的銀行機構的腐敗付出隱性成本。這些都造成外來投資（包括海外華人）在製造業中比本地資本更佔支配地位。

但是這一大規模運動的法律制度基礎仍未確立。非正式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已經產生，特別是在城郊地區。強大的原始積累浪潮隨之而至。例如，村社領導人在與外來投資者談判時經常實際握有村社土地和資產的產權，後來這些產權就給確認為歸屬他們個人，事實上是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把公共土地圈成少數人的私產。汪暉寫道，在這混亂的過渡中，「大量國家資產“合法地”和非法地轉化為少數人的經濟利益。」（註36）即使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土地和房地產市場的投機也很盛行，特別是在城市地區。然而，2004年私有財產權終於堂而皇之地載入中國憲法，標記了對本地企業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認可，這更合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慣例。中國共產黨已允許企業主加入，這可能會出現類如 “公─私”共治的體制，如前所述，新自由主義政權即以此為特徵。

簡言之，中國經歷了一場資產者與資本家階級徹底形成的過程，而不像在美國那樣，是一個前已存在的階級權力的復辟）。（註37）社會不平等當然從未消除中國經濟中的制度性不平等。城鄉差別甚至形諸法律。但在改革條件下，汪暉寫道，「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轉化為階級和階層的收入差別，從而促成了社會分化。」（註38）於是中國也很像美國的雷根時代所曾發生的，逐漸發展成一個非常獨特（而且幾乎可確定是不穩定的）混合體，結合了由政府指令用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融資建設基礎設施項目，與更不受約束的新自由主義式私有化，加上在威權統治下鞏固階級的權力。隨中國向外貿、資本流入和外國影響開放而至的壓力和機會，無疑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過一段過渡期後，在世界市場基本上勢必得遵從新自由主義的規則。但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權力與其運用威權手法自如的能力，以及轉軌過渡過程的特殊情況，使中國具有一些非常獨特的特點。中國的模態能否藉中國在世界的強大競爭力反過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常規道路產生強烈的影響，仍難立判。鑒於內含在新自由主義中的反民主傾向較為隱而不顯，中國明顯的威權體制特別令人憂慮不安。這麼說的言下之意是，轉向新保守主義（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某些歐洲國家，義大利尤其明顯），可能是內在於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傾向的加深，而非徹底的背離。而中國的競爭壓力可能會為朝向威權體制發展的這個趨勢增添動力。

然而，中國不是唯一在全球具有潛力的競爭者，僅舉兩個其他的例子，在俄羅斯和印度發生的階級改組，其影響也可能越過國界。（註39）像在坎昆會議中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和其他國家之間形成的新的體系聯合，很能標記在全球政治中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勢力，冷戰時期世界分為對峙的兩大陣營，1955年聚集於萬隆的國家另組成一個不結盟國家的集團，而在坎昆會議形成的聯合即使不比不結盟國家集團更具發展潛力，也同等重要。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顯示，我們所面對的絕不是單純從某個霸權中心“出口”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必須被看成一個沒有中心的不穩定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的特徵是各地區的不平衡發展和諸多生氣勃發的政治經濟權力中心之間強大的競爭壓力。

五、成就：再度盛行以剝奪達成資本的積累

要怎麼樣才能說轉向新自由主義已解決了資本積累趨緩的問題呢？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實際表現上，新自由主義乏善可陳。1960年代，全球總體的經濟增長率大約3.5%，即使在困頓的1970年代也只跌到2.4%。但後來的198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只有1.4%，1990年代則為1.1%，而自 2000年以後只近乎1%，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對刺激世界範圍的經濟增長大體是失敗的。（註40）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會給說服相信新自由主義是“不二法門”（ the “only alternative”），而且成績斐然呢？有兩個原因尤為重要：第一，地區不平衡發展的變動越來越劇烈，使某些地區靠犧牲其他地區而至少暫時得以有長足的輝煌成就。例如，若說1980年代主要屬於日本、亞洲“諸小虎”和西德，而1990年代屬於美國和英國，那麼同理，接著會另有其他地區獲得經濟成就，這一此起彼落始終有某個地區經濟表現出色的事實卻掩蓋了新自由主義總體上失敗的實情。第二，從上層階級的立場來看，新自由主義的成就宏偉。它或在美國和某種程度在英國讓統治精英重拾階級權力（見第二節），或在中國、印度、俄羅斯及其他地方創造了形成資本家階級的條件。這兩種情況的要害都在於不平等的擴大。（註41）藉著上層階級控制的媒體，便可大肆宣傳這樣虛妄不實的論調：經濟失敗的地區是因為競爭力不足，這種論調得逞後，就便於搞更加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這種謬論還說，企業的冒險和創新會提高競爭力與刺激增長，而一個區域內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對鼓勵企業的冒險和創新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底層階級的生活條件惡化，那也是因為他們由於個人和文化的原因，未能用心受教、具備基督新教勤儉致富的工作道德、服從工作紀律、敏於適應工作變動等等，以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簡言之，會出現各自特有的問題，都是因為缺乏競爭力，或者個人、文化和政治上的缺陷。這套謬論繼續說，在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只有適者才該也才能生存。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就這樣被鋪天蓋地的意識形態說辭與過於將危機歸因當地因素給遮掩住了。

如果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把既有的財富重加分配而不是增加生產擴大財富，那就得找到轉移資產的方法，把民眾的財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給上層階級，或從貧弱的國家轉給富裕的國家。我曾在別處以“用剝奪達成的積累”的題目說明了這些轉移財富的機制。（註42）馬克思曾揭示過資本主義初興時期的“初始”或“原始”資本積累，我所謂的“用剝奪達成的積累”與馬克思所論者同，意指持續擴展的資本積累行徑。這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像近來墨西哥與印度那樣的強行把農民逐出農村；將公共、集體、國有等各式各樣的產權轉化為私人獨佔的產權；壓制平民百姓的權利；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壓制本地的生產和消費形式；用殖民、新殖民與帝國主義的方式佔有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資產的過程；交易和稅收的貨幣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地租的貨幣化；奴隸貿易（這仍在持續進行，特別在色情的性產業中）；高利貸和國債，而最有破壞作用的是，利用信貸體系作為原始積累卓具成效的手段；國家政權因壟斷了暴力和規定何者合法的權力，在支持和促進這些原始積累過程上，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我們現在還可在這一系列機制中加上許多另外的手法，如：從專利權和知識產權中汲取租金，減少或者取消用一代（或不只一代）的社會民主的階級鬥爭贏得的多種公共財產權利（如國家撫卹金，有薪假期，公費教育和公費醫療）。例如，智利在獨裁統治下首開先河把所有由國家管理的退休養老金私有化，而這成了美國新自由主義念茲在茲的目標之一。

從“初始”和“原始”積累的角度論及中國和俄羅斯近來的事件或許說得通，但最好把美國與其他地方讓資本主義精英重獲階級權力的所作所為，看成正在進行的用剝奪達成積累的過程，這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快速躍居主導地位。我挑出四個主要部份加以論述：

1、私有化

把迄今猶存的公共資產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標記新自由主義計畫的特點。其主要目的是在原本不計盈虧的部門為資本積累打開新的場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水、電信、交通運輸等所有的公用事業、社會福利（社會住宅、教育、健康醫療、退休養老金）、公共機構（如：大學、研究實驗室、監獄）甚至戰爭（與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武裝部隊一道行動的私人承包商“部隊”很能說明這點），凡此種種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私有化了。由「世界貿易組織」所謂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所確立的知識產權，把基因材料、物種血漿以及其他產品的所有形態都規定為私人財產。使用生物藥劑的民眾對這些基因材料的研究發展本具有關鍵作用，這時反要為此而付費。盜用生物資源甚為猖獗而大肆掠奪世界儲備的基因資源則讓少數大製藥公司獲利。全球共有的土地、空氣、水日益損耗殆盡，生存環境惡化之處大量激增，使得農業只能以資本密集的方式生產，這也同樣是用各種方式把自然界全面商品化的結果。文化形式、歷史和創意經由觀光旅遊而商品化，造成全盤的剝奪（音樂產業已因佔有和利用民俗文化及基層民眾的創意，而臭名昭著）。如同以往，政府的權力經常給用來強制推動這些過程，甚至不惜違背民眾的意志。逼退旨在保護勞工和環境不致受害的管制體制，諸多權利也就不保。依新自由主義的正統教義推行的所有剝奪政策中不乏極端惡劣者，把國家退休養老金、社會福利和國家健康醫療這些經多年艱苦的階級鬥爭才贏得的公共財產權利又反過來轉交到私人領域，就是其中之一。所有這些過程都等於將資產從公共和民眾的領域轉而納入私人和特權階級囊中。羅伊(Arandhuti Roy)在論述印度的情況時說，私有化就意味「將生產性的公共資產從政府轉手給私人公司。生產性的資產包括自然資源。土地、森林、水、空氣。這些都是政府受它代表的人民委託代管的資產……攫奪這些資產，把它們當股票賣給私人公司是個野蠻的剝奪過程，規模之大史所未見。」 （註43）

2、金融化

1980年以後掀起的強大金融化浪潮，以投機與弱肉強食為特點。國際市場上金融交易的每日成交量從1983年的23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億美元。2001年的每年成交量有40兆美元，相較之下，支持國際貿易和生產性投資，估計僅需要8000億美元。（註44）解除管制讓金融體系成為藉由投機、掠奪、詐欺和盜竊重新分配財富的主要中心之一。股票促銷、龐吉詐術（Ponzi schemes）、因通貨膨脹而整體資產的毀滅、用併購剝奪資產、提高債務責任使整體民眾（甚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都淪為債奴，更別提公司詐騙、用操縱信貸和股票剝奪資產（藉股市崩盤和公司破產掠奪退休基金，使其遭受大量損失），凡此種種都成了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主要特點。資本所有者用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s）付給資本管理者報酬，兩者的利益藉此結合起來，遂極為看重股票的價值。如我們現在所知，這造成對股票市場的操縱，大量財富因而以犧牲許多人的利益為代價流到少數人手裏。恩龍（Enron）公司舉世矚目的破產，很能代表剝奪許多人的生計和養老權利的普遍過程。此外，我們也應注意對沖基金（hedge funds）與金融資本的其他主要機構利用股票投機掠取利益，因這是在全球用剝奪達成積累的真正最重要的手段，即使這被以為給了資本家階級“分攤風險”的正面利益。（註45）

3、危機的管理與操縱

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的金融操縱都有投機泡沫的特點，而且還經常是詐騙性質的泡沫，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過程把觸發“債務陷阱”作為以剝奪達成積累的主要手段。（註46）在全世界製造、管理和操縱危機，已經發展成刻意把財富從窮國重加分配給富國的高明手法。1979年，弗克爾突然升高利率，借款國必須償付的債務利息在美國國外收入中所佔的比例便提高了。像墨西哥之類的一些國家被逼破產，只好同意經濟結構調整。美國宣稱自己是個安排紓困資金以維持全球資本積累的穩定和正常進行的高尚領導者，但美國同時也在墨西哥當地發生危機時運用本身強大的金融勢力，為掠奪墨西哥經濟大開方便之門。這就是美國財政部/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複合體最擅長在各地幹的勾當。1990年代，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格林斯潘就有幾次用了與弗克爾同樣的策略。在1960年代，個別國家並不常發生債務危機，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卻屢見不鮮。發展中國家幾乎都難以倖免，在像拉丁美洲這些地方，這類危機的頻率之高，已可視為當地特有的痼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些債務危機被策畫、管理和控制，目的既在把資本主義體系合理化，也在重新分配資產。韋德和弗納羅索（Wade and Veneroso）在論述1997─8年由美國對沖基金的操作而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時，切中要害：

「金融危機總是把所有權和權力轉移給那些得保資產安然無恙和有能力創造信貸的人，亞洲的危機也不例外……西方與日本的公司無疑是大贏家……大幅的貨幣貶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的金融自由化與其促進的經濟復蘇，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更加速了國內資產向國外的轉移，規模之大為過去50年來舉世在和平時期所未有，連19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或1994年墨西哥的國內資產向美國所有者的轉移，也相形見絀。這讓人想起米倫（Andrew Mellon）說過的話：“在蕭條時期，資產回到它們正主兒的手裏。”」（註47）

這完全與刻意製造失業產生大量低工資的剩餘勞動力以便進一步積累雷同。有價值的資產報廢，喪失了價值。它們閒置無用，奄奄一息，直到握有流動資金的資本家加以青睞，大肆利用，才給他們注入新生命。然而，危險的是，危機可能失控，蔓延全局，或者民眾會蠭起反抗造成危機的體系。國家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精心安排危機和貶值，使積累可以靠剝奪達成，又不致引起全面的崩潰或民眾的反抗。由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複合體施行的結構調整計劃，負責讓積累得以靠剝奪達成，而有帝國主義強權的軍事援助撐腰的新自由主義買辦政權則在遭掠奪的國內職司確保不會發生民眾的反抗。但不久就出現了民眾反抗的跡象，首先是1994年在墨西哥的薩帕塔（Zapatista）起義，其後便是在西雅圖奮力抗爭的反全球化運動所表現出的普遍不滿。

4、國家政權執行的財富再分配

國家政權一旦轉化成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機構，就成為再分配政策的主要執行者，社會民主派當權時期財富從上層流向低層階級實行再分配，這時則倒頭逆轉。先是實行私有化方案，並砍掉支持社會工資（social wage）的國家支出。即使在私有化看似對低層階級有利時，長期效果也會不利。例如，乍一看來，撒切爾在英國實行的社會住房私有化計劃似乎是送給底層階級的一個禮物，底層階級此時可以用較低的成本由租用轉為所有，獲得有價值的資產，增加他們的財富。但一旦完成了產權轉移，房產投機就接管了，特別是主要的市中心地帶，最終收買或強迫低收入人口搬出遷移到像倫敦這類城市的外圍，往昔工人階級居住的地區給改建成豪宅中心。在市中心區喪失了負擔得起的住房，造成許多人無家可歸，也使那些從事低薪服務工作的人上下班的路程非常之長。墨西哥村社農場的私有化成為1990年代制訂的新自由主義計畫的中心內容，對墨西哥農民的前途造成類似上述的影響，迫使許多農村居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尋找工作。中國政府也完成一系列嚴酷的步驟，損害人民大眾的利益，把資產交給一小撮精英。

新自由主義政權也用許多其他的方法謀求再分配，如：修改稅則以有利於投資收益而不是收入與工資，在稅則中提高累退的部份(如銷售稅)，把原本由政府支出對所有人免費的項目改為使用者付費（如高等教育），以及給公司提供大量補貼與免稅等等。如今美國在聯邦、州以及地方各層級的公司福利計 劃等於把民眾的錢轉為公司的利益（直接的方式如補貼農業公司，間接的方式如給軍事工業部門訂單），非常類似於美國實行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稅，大量補貼高收入屋主與建築業。監視和警戒的加強，以及（如美國的情況）關押不服從的民眾，顯示嚴酷的社會控制發揮了更加邪惡的作用。在發展中國家，反抗新自由主義與以剝奪達成的積累可有更強大的力量，新自由主義政權很快便大肆鎮壓，甚至對像墨西哥的薩帕塔或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這類反抗運動發動小型戰爭（許多反抗運動現在可以隨便給指為“恐怖份子”以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支持）。（註48）

事實上，羅伊（Roy）說，「維持七億人生存的印度農業經濟正被勒得喘不過氣來，生產過多的農民陷入困境，生產太少的農民也處境危殆，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因大莊園與大農場解雇農工而失業，他們全成群結隊跑到城市找工作。」（註49）在中國，據估計，如果要避免農村的混亂和反抗，在下個十年內必須以城市化吸收至少5億人。還不清楚他們在城市會做什麼事，雖然如我們所見，目前正在規劃的大量物質基礎設施設總會吸收由原始積累排斥出來的剩餘勞動力。

新自由主義的再分配策略繁複多樣，精巧細密，經常先用意識形態的漂亮說辭加以掩飾，但對弱勢人群和地區的尊嚴與社會福利損害極大。用剝奪達成積累的步驟正在加緊進行，全球的正義運動已花了許多工夫揭露其使用的手段和後果。再來的問題便是，對這些步驟的反抗歷來是怎麼被表述的，又怎樣能表述得更好。

新自由主義內部的矛盾與對抗

新自由主義在本身內部引發廣泛的對抗文化。然而，對手往往接受許多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前提，集矢於內部矛盾。對手慣常看重個人權利與自由，以此反對威權統治，也以此反對經常恣意橫行的政治、經濟與階級權力。對手接受新自由主義誇言要改善所有人福祉的堂皇說辭，而譴責新自由主義言不符實。例如，檢視新自由主義規劃的精髓─WTO協定的第一段重要章節。WTO的目標是：

「提高生活水準，保證充分就業，大幅穩步提高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且在依據永續發展的目的充分利用世界資源之際，擴大商品與服務的生產和貿易，力求既能維護和保存環境，又能以符合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各自需要與關切的方式，加強做到上述成效的措施。」（註50）

類似的空中樓閣可見於世界銀行的多項聲明中（「減少貧窮是我們的主要目標」）。這一切都與加強階級權力的復辟或形成階級權力的復辟的實際作為扞格不合。

自1980年左右，指控違反人權的反對聲浪便甚囂塵上。錢德勒表述說，在那之前，像《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這樣的重要刊物，連一篇論及人權的文章都沒有。（註51）1980年以後，人權問題備受矚目，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與冷戰結束之後，更廣為關注，成了熱門議題。這與新自由主義的軌跡正相符合，這兩種運動實深相結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疑，新自由主義堅持個人為政治經濟生活中基本的重要要素確實為廣泛的爭取個人權利的運動開啟了大門。但是，新自由主義的反對者把重點集中放在個人權利，而非創造或重建實質且開放的民主治理結構，故發展出來的反對方式並無法避開新自由主義的陷阱。新自由主義擁護的個人權利可被允許凌駕所有社會民主所關切的平等、民主與社會團結。例如，經常訴諸法律行動就是接受新自由主義將議會權力轉移到司法與行政權力。但走法律途徑既所費不貲又遷延耗時，而且法庭一貫嚴重偏袒統治階級的利益，這點不論從司法系統的階級效忠，或從絕大多數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整個司法裁判歷史都置私人財產權與利潤率於平等權及社會正義之上，皆可看出。法律取代政治「充當在公共環境中表達各種需要的手段」。錢德勒下結論說：「正由於自由主義派的精英對平民百姓與政治程序深感失望，他們更看重賦有權力的個人，把他們的案件交給聽訟裁決的法官。」（註52）

由於大多數貧困的人缺乏財力實現他們本身的權利，唯一能表達這個理想的方法，就是組織倡導權利的維權團體。維權團體與各種非政府組織（NGOs），就像更廣泛而言的權利論述一樣，是隨著轉向新自由主義而來的，自1980年左右，如雨後春筍大量增加。政府不再提供社會必需品後，非政府組織在許多情況下，填補政府遺留下的缺位。這等於是由非政府組織將政府的社會服務職能私人化的過程。在有些情況下，這似乎是幫助加速政府進一步撤除社會服務的職能。非政府組織因此發揮了「充當全球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特洛伊木馬」的作用。（註53）更有甚者，它們不是民主的組織。它們往往由少數精英控制，不可究責，且按其本義，即與它們要保護或幫助的人頗有距離，不論它們有多麼好意。它們經常隱蔽它們的工作計劃，偏好直接與國家及階級權勢集團磋商或施加影響。它們慣於控制它們的委託人而不是代他們反映意見。它們佯稱代表那些無法自己發言的人說話，甚至擅自界定它們代言的那些人的利益（彷彿人民無能明確知道自己利益之所在），但它們的地位的正當性總是大受質疑的。（註54）例如，在非政府組織視禁止童工參加生產活動為普世人權加以鼓吹而獲得成效時，它們可能損害了不靠童工就無法存活的經濟體。而若沒有另外可取的經濟方案的話，小孩可能要轉而被賣去從娼（卻讓另一個維權團體去力求根除童妓）。「權利論調」預設的普世價值與非政府組織、維權團體為實行普世原則的所作所為，和當地的特殊狀況及政治經濟生活的日常做法格格不入。（註55）

但這種特殊的反對文化何以近年來獲得這麼大的推動力，還有另一個理由。用剝奪達成的積累必然會有一套非常不同於以擴大工農業的工資勞動者來積累的做法。後者主導1950與1960年代的資本積累過程，產生一種造成社會民主式的妥協的反對文化（如深植在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中者）。剝奪則是分散在不同的特定領域內進行的──在此地是私有化，在彼處是環境的惡化，在其他某個地方則是債務的財政危機。不訴諸普世的原則，就很難反對所有這些具體而特定的領域的剝奪行為。剝奪必然造成權利的喪失。因此就轉向人權、尊嚴、永續的生態行為、環境權等諸如此類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用辭，以做為統一反抗剝奪的政治鬥爭的基礎。

這種訴諸權利的普世價值的籲求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而且也可以為抱持進步的目標所用。由「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無國界醫生」（Medecins sans Frontieres）及其他組織最明顯代表的傳統，不能被視為僅是新自由主義思維的附屬品而輕忽不顧。整個人道主義的歷史（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與各種非西方的人道主義）頗為複雜，不能這樣簡單處理。但許多權利論述的有限目標（就「國際特赦組織」而言，直到最近都只專注在公民與政治權利而不及於經濟權利）使人太容易把它們納入新自由主義的框架。普世價值論似乎與氣候變化、臭氧層破洞、破壞棲息地造成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類全球議題特別合拍。但在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環境與文化習俗歧異多端下，普世價值論應用在人權的領域內則成為比較受爭議的問題。再者，要把人權問題歸為「帝國的利劍」（用巴塞羅蜜與布蕾克斯皮爾〔Bartholomew and Breakspear〕銳利的描述法來說（註56））向來是易如反掌的事。例如，美國所謂「自由主義的鷹派」就一直訴諸人權來證明帝國主義在科索沃、東帝汶、海地，尤其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干預是正當合理的。他們證明用武力實行人道主義是合理的，「以保護自由、人權與民主之名，甚至在由一個自己委派任務的帝國主義強權片面實行時也正當合理」，像美國這樣。（註57）更廣而言之，很難不與錢德勒一道得出結論說：「今天以人權為基礎的人道主義干預的根源在於這種日益增長的共識：支持西方自1970年代以來對發展中國家內政的介入。」關鍵的論點是：「國際機構、國際與本國的法庭、非政府組織或道德委員會比被選出的政府更能代表人民的需求。政府與選出的代表被認為不可信，正因為他們的選民要求他們負責，所以被認為具有“特殊”的利益考量，而不會依據道德原則行事。」（註58）在國內事務上這種論點也有同樣的隱伏的惡果。其惡果是「藉著把司法部門、非由選舉產生的特別任務工作組、道德委員會日益增大的決策作用合理化而減少公眾的政治辯論。」這樣政治的作用就可能會削弱。「人權的管控遠非質疑我們原子化社會的人各為己與消極被動，而只是把人與人的割裂離析制度化。」更糟的是，「人權的道德論述所提供的觀點，使視社會為一個整體世界的觀點倒退，如同其他的精英理論，起了維繫統治階級自信的作用。」（註59）

鑒於這種批判，就有這樣的誘惑即：把所有訴諸普世標準的主張都視為犯有致命的錯誤而避之唯恐不及，以及視權利為充當遮掩階級權力復辟的假面具，乃站不住腳的抽象道德要求，故而絕不願再提及。雖然這兩種主張都值得認真考慮，但我認為捨棄這個戰場給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是不幸的。有場該打的仗，這場仗不僅是針對在特殊的情勢下那一種普遍的標準和什麼樣的權利該被援用，而且也針對普遍的原則與權利的概念該如何建構。在這場仗中，我們應警覺到有個給鍛接在一起的關鍵連結，即：一方面是一套在特殊環境下演變出來的政治經濟慣例的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日益籲求以某類普遍適用的權利充當道德與政治正當性的基礎，這兩方面給刻意聯繫起來。布雷默法令強加某種權利的概念在伊拉克頭上。同時它們也違反了伊拉克的自決權。馬克思在他寫的為工作日長度而鬥爭的那一章（譯者按：《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有句著名的評論：「兩種〔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的作用。」如果階級復辟必然強加一套特定的權利，那麼反抗這種強加也必然會引起要求完全不同的權利的鬥爭。

例如，以正義為一種權利的積極意義在政治運動中一直發揮強有力的啟動作用：反對不正義的鬥爭一直強有力地激發要求改變社會的運動。當然，問題是有不計其數的正義概念可供我們訴求。但分析顯示，某些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過程突出並依靠某些公正與權利的概念。質疑那些特殊的權利就是質疑它們與之俱生的社會過程。反之，要使社會脫離某種主導的社會過程（如藉市場交換進行的資本積累）轉向另一個（如政治民主與集體行動），而不同時把對一種主導的權利與正義概念的擁護轉向另一個，已證明是不可能的。所有用唯心論的思維來解釋權利與正義的說明，之所以遇到困難就在於它們掩藏了這種連結。只有在它們論及某個社會過程立足於現實時，才能發覺社會的意義。（註60）

例如，考慮新自由主義的情況。各種權利圍繞兩套主導的權力邏輯聚集──領土國家的權力邏輯與資本的權力邏輯。（註61）首先考察國家權力。不論我們多麼希望權利是普世適用的，要實現那些權利卻必須有國家機器的保護。如果政治權力不願意，那麼權利的概念就依然是空洞的。在這個情況下，權利基本上是衍生自公民身份並且依賴於公民身份。於是管轄的領域就成了一個問題。這可分兩方面來說。由於出現無國藉者、無身份證的移民、非法移民等等，難題就來了。在全國或地方政府的轄區內，誰是或不是“公民”，怎麼確定接納與排除的原則成了嚴重的問題。在關於權利方面，國家怎麼行使主權，本身是個聚訟紛紜的問題，但深植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中的規則，給國家實行這方面的主權施加了限制（如中國現正發覺到的）。然而，民族國家挾其對各種合法的暴力的壟斷，可以用霍布斯式的方式（譯按：指倚恃權力強行己意）界定自己的一大批權利與對權利的一大批詮釋，而只受國際公約寬鬆地束縛。舉一例來說，美國堅持它有權利不對國際場域所確定的反人道罪行負責，而同時又堅持其他地方的戰爭罪犯應交由法庭繩之以法，但正是完全同樣的這些法庭，一涉及自己的公民，它就否認其有權審理。

生活在新自由主義下也表示接受或屈從資本積累所必要的一批自由主義的權利。因此，我們生活在一種社會中，這種社會的個人私有財產與利潤率的不可讓渡的權利（回想一下，公司在法律上被定義為法人個體）壓倒其他你所能想到的不可讓渡的權利。這種權利體制的辯護者言偽而辯地爭論說，它激勵了「資產階級的德行」，沒有這些德行，世界上所有人會糟糕得多。這包括個人的責任與義務，免受國家的干預（這種論調經常以新自由主義的權利體制激烈反對政府所界定的權利體制），在市場與法律上的平等機會，獎勵創新與冒險奮發求利的企業精神，關注自身與私產，以及一個允許廣泛的自由選擇訂約與買賣的開放市場。當這個權利體制擴及個人人身的私有財產權（這支撐了個人自由訂約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受到尊重並免於像奴隸制下的人身壓迫的權利），以及自由思想、表達、言說的權利，看來就似乎更具說服力了。我們且承認：這些衍生出來的權利引人心動。我們許多人頗為倚重這些權利。但我們像極了乞丐靠著從富人桌上來的麵包屑過活。容我解釋。

我無法用哲學論證來使任何人相信新自由主義的權利體制是不公不義的。但反對這種權利體制極其簡單：接受這套體制就是接受這種情況，即：我們除了活在一個不論有何社會、生態或政治後果也要進行無休止的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體制下，別無其他選擇。與此相應，無休止的資本積累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權利體制必須靠暴力（如在智利與伊拉克），靠帝國主義的做法（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所作所為），或者在必要時藉由原始資本積累（像在中國與俄羅斯那樣），在地理上擴張遍及全球。私有財產與利潤率的不可讓渡的權利將會被無所不用其極地在全世界確立。這正是布希說美國全心致力於擴展自由的領域至全球各地時的意之所指。

但這些不是我們唯一可用的一套權利。甚至在聯合國憲章所列出的自由概念中，也有諸如言論與表達的自由、教育與經濟保障的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等等衍生的權利。實行這些權利必然會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行徑構成嚴重的挑戰。讓這些衍生的權利變成基本的權利而使私有財產與利潤率的基本權利倒過來變成衍生的權利，必會在極關重要的政治經濟活動中造成根本的變革。也有完全不同的權利概念可供我們訴求，例如，享用全球公地、水源的權利或獲得基本食物保障的權利。「兩種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的作用」，為正確的權利概念進行政治鬥爭，會把舞台中心移向怎麼說明、表述各種可能性與替代方案，並最終產生朝向變革體制的政治經濟實踐。如巴塞羅蜜與布蕾克斯皮爾所論，重點「是恢復人權的政治鬥爭為一個至關重要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全球對抗規劃的一部份」，我想補充說，以及對抗新自由主義本身。（註62）但我們會在結論中回到這個問題。

新保守主義的反應

汪暉在反思中國最近的歷史時說：

「在理論的層面，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現的『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和國家現代化的理論敘述．．．．．都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存在密切的、這樣的或那樣的關係。這些名目的相互替換（甚至相互矛盾）顯示了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權力構架的轉變。」（註63）

就新保守主義主張威權統治、窮兵黷武政策、權力的上下等級之別來說，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精英統治與不信任民主的規劃完全一致。從這個立場來說，新保守主義似乎僅是撕開了新自由主義力圖隱藏其間的威權思想的帷幕。但新保守主義確實對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矛盾之一提出了獨特的對策。如果像撒切爾夫人所首先表述的：「沒有社會這回事，僅有個人」，那麼個人競逐利益所造成的混亂終究很容易就會壓過秩序。市場、競爭與縱情恣意的個人主義（個人的希望、慾望、焦慮、恐懼；生活方式、性癖好、性向的選擇：自我表達與對待他人的行為方式）的無序混亂狀態造成一種似乎越來越無法管治的情勢。甚至可能導致所有社會團結的紐帶崩裂，瀕臨社會混亂與道德虛無的狀況。

面臨這種情況，要恢復秩序，某種程度的強制似已不可避免。新保守主義偏好並強調軍事化是對個人爭相競逐利益造成的混亂的一劑解毒良方。因此他們大有可能突出對國家的完整與穩定的威脅，不論是真實的或想像出來的，國內的與國外的。在美國，這就造成霍夫斯達特所說的「美國政治的被迫害妄想偏執風格」，國家被描述成受國內與國外的敵人圍困、威脅。（註64）這種政治風格在美國有長久的歷史，它依靠培育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20世紀，反共產主義是這種思想的核心焦點（雖然無政府主義與對中國、移民的恐懼過去也曾發生作用）。因此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貨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它已經在勢力強大的軍事─產業複合體找到了特有的歸宿，這個軍事─產業複合體在不斷的軍事化中有既得利益。但冷戰的結束提出了這個問題：對美國安全的威脅來自何處？激進的伊斯蘭教徒與中國成了兩個最受青睞的外來威脅者，而內部的異議運動（在德州韋科鎮遭焚毀的大衛教派，支援奧克拉荷馬州爆炸案的民兵運動，毆打羅德尼．金後發生的洛杉磯暴動，最後是1999年的西雅圖騷亂）則必須在國內被設定為目標加以更嚴密的監視、管控。1990年代真正出現的威脅來自激進伊斯蘭教徒，這個威脅至9．11事件而達到極致，最終成了關注的中心焦點，美國宣稱要進行持續不懈的「反恐怖行動戰爭」，實行在國內與國外的軍事化，以確保國家的安全。雖然，很明顯，針對紐約貿易中心遭受兩次攻擊所顯示的威脅被要求要有某種察/軍事行動以為應對，但新保守主義者上台掌權卻必然對此威脅作出全面的、就許多人的判斷屬於過度的反應，導致在國內與國外轉向廣泛的軍事化。

雖然新保守派巴不得使用強制的權力，但他們也知道取得某種程度的同意還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義力圖恢復道德目的的意識、某些形成政體穩定中心的更高的秩序價值。目的是要藉此控制在新自由主義精神內部威權主義與個人自由的明顯矛盾，並抵消新自由主義通常會產生的個人利益的混亂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這絕沒有偏離新自由主義建構或恢復一個支配性階級權力的規劃。但它藉由建構一個認同中心道德價值的氛圍，為統治階級謀取正當性。這立即引起那種道德價值將成為中心的問題。例如，訴諸深植在美國人權法案中的自由主義人權體系是完全可行的：畢竟，人權推動論的目標，如卡多爾（Mary Kaldor）所言：「不僅是介入保護人權，而且要創建一個道德共同體。」（註65）但這就會與轉向軍事化不一致。

在美國，把已成新保守主義運動最重要的道德價值看成特殊聯盟的必然結果，就能得到最好的理解，這個聯盟建立於1970年代，一方是意圖恢復他們的階級權力的精英階級與商業界，另一方是選民中因不滿現狀而加入“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由福音派基督徒於1979年成立的右翼保守政治組織──譯者）的白人工人階級。道德價值集中在文化民族主義、道德正當、基督教（某種福音派）、家庭價值與生命議題的權利，並且敵視新社會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權利、肯定行動、環保運動等等）。在里根當政時期，這個聯盟雖然主要是策略性的，柯林頓年代的國內失序卻使道德價值的爭論在共和黨的小布希當政時躍為當務之急。現在它形成新保守主義運動道德事務的核心。

這種意識形態的鞏固對國內與國外都有影響。在國際舞台上，無可避免地要大叫大嚷「美國價值」的優越性，把“美國價值”當成所有人類的“普世價值”來展示。這使得美國彷彿在世界舞台為（據說它代表的）“文明的價值”從事“十字軍”東征（那確實是）。美國在全球舞台的行為中所包含的民族主義變得明目張膽起來，道德十字軍的意識影響了每天的外交事務，特別是有關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衝突，強烈相信世界末日論的美國基督教右派視以─巴衝突與他們本身的命運息息相關。美國內部的道德優越感在它關閉了國內公開對話與說服協商的可能性時，也同時激起了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敵視。布希政權轉向新保守主義造成一種非常不同於柯林頓總統任內的世界地緣政治關係的氛圍，柯林頓是試圖以多元文化的新自由主義處理世界地緣政治關係。

但若以為這種新保守主義的轉向只限於美國或美國所特有，那就錯了，雖然有些在美國發生作用的因素可能不會在其他地方呈現。在美國內部這種對道德價值的肯定極為倚賴訴諸國家、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等等的理想，而這些理想絕不只美國有。例如，近些年日本與中國的民族情感上升已為人注目，在這兩個例子中，民族情感的上升可以視為對受新自由主義的衝擊而崩解的原本社會團結紐帶的一帖解藥。強大的文化民族主義潮流在如今構成歐洲聯盟的老民族國家（如法國）內部正方興未艾。印度民族主義黨近來順利把新自由主義政策輸入印度，在這背後有宗教和文化民族主義提供道德的主幹。伊朗革命援用道德價值，其後轉向威權體制這並沒有導致那兒完全丟棄新自由主義的做法，雖然這場革命是針對無節制的市場個人主義的墮落而來。像新加坡與日本這樣的國家，他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是“墮落”的，美國的文化多元論是駁雜不純的，與之相較，他們的道德要更為優越，長期來這些國家瀰漫著道德優越感，也蘊藏有類似伊朗、印度的推動力。新加坡的情況特有啟發性。它結合了市場上的新自由主義與嚴酷、強制、威權的國家權力，同時又召喚精神上的同心同德，這些休戚與共的精神是奠立在如下的理想上：一個被圍困的島國（在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後），儒家的價值觀，

以及最近因應它在國際貿易世界中的地位而加入的獨特形式的世界性道德規範。

很明顯，新保守主義運動的鞏固存在著諸多危險，每個新保守主義運動都採用自己獨特而據說優越的道德價值，同時又準備好要實施嚴酷的強制作為。凡看來像是解決新自由主義的矛盾的答案，都太容易翻轉為問題。事實上，新保守主義力量的擴展，雖然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扎根的方式非常不同，卻突出了陷入相互競爭甚或交戰的民族主義的危險（若不是陷入如杭廷頓之流誤認的那種世界舞台上必然要發生的不同文明的衝突的話）。如果有必然性，那也只出自轉向新保守主義而非出自文明差異的永恆真理。因此摒棄新保守主義的對策，找出其他方案來處理（若不是完全取代的話）新自由主義的矛盾，就可輕易地拒斥這種所謂的“必然性”。正是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就要轉回來討論。

取代的方案

我們的任務既是瞭解世界，如馬克思久已說過的，也還要改變世界。但若不是在現存條件中已潛藏改變的因素，社會秩序就不可能改變，若不是在傳交給我們的歷史與地理條件下，我們也無望創造我們的歷史與地理，那麼以批判的眼光研究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地理學以及之後轉向新保守主義的任務就是從研究現狀探索他種未來的各樣前景。

有兩條主要的途徑可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考察為數眾多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從中提煉出一個基礎廣泛的反對計畫的精髓。或者，我們可以對我們的現存條件從事理論和實踐的分析（即我在這裏所做的這一類）以確定取代的方案。採後一條途徑絕不是認為現存的反對運動有誤或認為他們的認識有些什麼缺陷。同理，反對運動也不能以為分析的成果對他們的事業無關緊要。任務在於開啟採取兩條途徑的人的對話，藉此加深對各種可能性和可行的取代方案的集體認識。

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和外部都滋生出大量的反對運動。這些反對運動中有許多根本不同於1980年之前主導反對運動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我說的是“許多”而不是“所有”。傳統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絕沒有壽終正寢，就算在工人運動的權力因遭新自由主義猛烈攻擊而大為削弱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亦然。南韓與南非在1980年代興起蓬勃的工人運動，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就算沒當政，也蒸蒸日上。在印尼，一個公認深具潛力成為重要力量的工人運動正奮力發聲以為人所知。中國工人的抗爭雖尚難預料，但潛力不容小覷。情況也不明的是，美國的工人階級群眾在上個世代為了文化民族主義、宗教和反對多種社會運動而一直投票反對本身的物質利益，他們是否會永遠受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陰謀詭計所欺而陷在這種政治策略裏不能自拔。由於事態變動不居，沒有理由排除未來會再興起帶有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規劃的以工人為基礎的政治鬥爭。

但反對剝奪式積累的鬥爭激起了路線非常不同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鬥爭。（註67）部分是由於產生這類運動的獨特條件，它們的政治方向和組織方式相當不同於那些典型的社會民主的政治鬥爭。例如，墨西哥的薩帕塔起義（Zapatista rebellion）就不指望奪取政權或達成政治革命。它追求的是一種更能廣納各方參與的政治，讓整個公民社會以更開放流動的方式，尋求能顧及不同社會群體的特定需要並允許他們改善自己命運的取代方案。在組織上，它刻意避免用先鋒隊領導的體制，拒不採取政黨形式。而更喜歡保持為一種國家內部的社會運動，力圖形成一種以本土文化為中心而非使之淪為邊緣的政治力量集團。它希圖藉此達成在領土國家的權力邏輯內類如消極革命的東西。

所有這些運動的效應就是：把政治組織的活動範圍從傳統的政黨和工人組織轉移到遍及整個公民社會而政治動力較不集中的社會行動。不過它們在力量的集中上有所失，卻在聯繫上有所得。它們植根於日常生活的細節和鬥爭，從中汲取力量，但在這麼做時，經常發覺難以從地方性和特殊性的事務中抽身，以瞭解新自由主義過去和現在都在怎麼搞剝奪式積累這樣的宏觀政治。這些鬥爭的種類之繁多簡直令人驚詫。甚至難以想像它們之間會有什麼聯繫。它們都是變動多端、混雜不一的抗議運動的一部份，這些抗議運動自1980年代期間以降席捲世界並日益成為頭條新聞。這些運動和反抗有時遭到殘忍的暴力鎮壓，大多是國家政權以“秩序和穩定”之名實行的。在其他地方，即資產階級的勢力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的地區，當剝奪式積累造成激烈的社會和政治對抗時，這些抗議運動也會產生種族間的暴力衝突和內戰。得到軍事支持或在某些情況下擁有由（美國為主，英、法為輔）主要軍事機構培訓的特種部隊的附庸國家，在一個壓迫與清除異己的體系中率先殘酷制止那些積極挑戰剝奪式積累的運動。

這些運動本身已產生大量有關取代方案的想法。有些力圖全部或部分與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勢不可擋的權力脫鉤。另有一些則想改革或取消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強大機構，以獲取全球的社會與環境正義。還有一些強調「收復公共資源」這個主題，藉此標明既與源遠流長的鬥爭有深刻連結，也是延續在整個痛苦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中始終奮戰不懈的鬥爭。有些人設想用遍地開花的行動，或在全球公民社會內部的運動來對抗新自由主義秩序散佈各地而沒有中心的勢力，另一些人則比較溫和地寄望由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與生態實踐發動，在各地方實驗新式的生產和消費體系。也有人相信比較傳統的政黨組織，以取得國家政權進而改革全球經濟秩序為目標。這些分歧的力量現在有許多匯集到「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試圖確定他們的共同點並建立一個能對抗多種多樣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組織力量。這很令人欽仰、振奮。

但是從這種分析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整個由社會民主的妥協到隨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歷史都表明了階級鬥爭不論在制止還是復辟階級權力上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段歷史雖然被有效地遮掩，但我們已經歷了一整個世代由社會上層為了復辟（在中國和俄羅斯則是為了建構）無可抵擋的階級權力而發動的詭詐機巧的階級鬥爭。而進一步轉向新保守主義則說明了那個階級會使出多少解數，以及為了保持和加強它的權力而準備好要運用的戰略。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這幾十年中，這段期間許多進步人士在理論上被說服說階級是個毫無意義的範疇，也在這段期間，那些曾經一直代表工人階級從事階級鬥爭的機構遭受了猛烈的攻擊。因此，我們必須學習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如果看來像階級鬥爭，並且像階級鬥爭那樣行動，那我們就必須據實命名。民眾必須兩者擇一：或委身聽命於這個勢不可擋的階級權力所規定的歷史和地理軌道，或從階級的立場有所反應。

這麼說並非對已逝的無產階級活躍的黃金年代油然興起懷念之情。也不是必然表示（如果曾經有過）有個簡單的無產階級概念可讓我們訴求為歷史變革的主要（更甭說是唯一的）推動者。並沒有我們可以退遁到其中的烏托邦式馬克思主義幻想的無產階級場域。指出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並不是說階級給建構起來的方式是規定好的，或甚至可事先決定的。階級運動是階級本身造成的，雖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情勢下。分析顯示，那些情勢目前叉分為兩類運動，一種是針對擴大再生產問題的運動，其中心問題是工資勞動的剝削和確定社會工資的條件，另一種是針對剝奪式積累的運動，從用破壞文化、歷史和環境的做法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典型形式到當代形式的金融資本造成的劫掠，所有這一切都是抵抗的焦點。找出這些不同的階級運動之間的有機聯繫是個急迫的理論和實踐任務。但分析也顯示，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追索一條資本積累的歷史地理軌跡，這樣的資本積累奠基於越來越緊密的跨越時空的連結，但也以世界各地區的發展越來越不平衡為特點。這種不平衡必須被瞭解為是由資本積累的過程主動起作用造成和維持的，不論過去在文化景觀和社會世界中設立起來的結構的殘跡會有多麼重要。

但分析也顯示了在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規劃內部可以利用的矛盾。花言巧語（為所有人的福祉）和實際結果（一小撮統治階級的利益）之間的差距隨時間和空間的延伸而日益擴大，社會運動集中針對那樣的差距著墨甚多。所謂市場就是競爭和公平的想法越來越被公司和金融勢力異常的壟斷化、集中化和國際化的事實所否定。在國家之內（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南非）以及國與國間，階級和地區的不平等的驚人增長提出了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再也不能拿什麼邁向一個完美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的「過渡」時期來遮人耳目。新自由主義越被看穿不過是個用來順利掩飾階級權力復辟的失敗的烏托邦方案，就越為表達平等的政治要求、追求經濟正義、公平貿易和更大的經濟保障的群眾運動的興起奠立基礎。

在新自由主義下權利論述的興起也是問題與機會並生。即使訴諸傳統的自由主義權利概念也能形成一把用來批判新保守主義威權思想的強有力的「抵抗利劍」，特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反恐戰爭」到處（從美國到中國和車臣）都給用來當做縮減公民和政治自由的藉口。日益高揚的要求承認伊拉克自決權和主權的呼聲是個可用來制止美帝國主義布局的強大武器。但另有其他一大批權利也可被規定出來。我在其他地方論述了了一批權利，包括生活機會權、為了讓直接生產者控制生產而有的政治聯合和「良好」治理的權利、人身不可侵犯和完整權、從事批判而不用憂心報復的權利、宜人的健康的生活環境權、對公共財產資源的集體控制權、空間的生產權、差異權以及我們身為人類的地位固有的各種權利。（註68）無休止的資本積累是決定我們生活的主導過程，批判它也就必然要批判與之俱生的特定權利——個人財產權和利潤率權利，反之亦然。因此，提出一批不同的權利也就有義務詳細說明這批權利可與之俱生而深植其間的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過程。

類似的論點也可用在新保守主義為本身的權威與正當性而尋求道德高地上。左派歷來並不自外於道德共同體和道德經濟的理想，許多反對剝奪式積累的運動也都積極從道德經濟的角度表述要建構另一種不同的社會關係。道德並不是一個應該僅由反動的宗教右派規定的領域，宗教右派的道德觀由媒體霸權傳播流佈，並藉由公司的金錢權力支配的政治過程來表述。統治階級的權力在一大堆淆亂視聽的道德論點下復辟，對此必須挺身對抗。所謂的「文化戰爭」——不論其中一些可能曾被誤導——不能（像一些傳統左派一樣）視之為徒然使人無法專注於階級政治鬥爭的不受歡迎因素而置之不理。實際上，在新保守派內部興起道德論辯不僅證實了在個體化的新自由主義下對社會解體的憂慮，也證實了廣泛的道德厭惡感已起而反對新自由主義世界造成的異化疏離、失序、排斥、邊緣化和環境惡化。轉化這種道德厭惡感為文化的抵抗再進而為政治的抵抗是我們的時代需要正確解讀而不是迴避不顧的一個特點。此種文化鬥爭與扭轉階級權力無比鞏固的局面的鬥爭，這兩者之間的有機聯繫，需要有理論和實踐的探究。

但正是這種由新保守主義威權思想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的深刻反民主本質，當然應該是政治鬥爭的主要焦點。像美國這種名義上「民主」的國家，現在有重大的民主缺陷。（註69）那兒的政治代表性遭受金錢權力的損害和敗壞。基本的制度安排有嚴重的偏差。由不足人口20%的二十七個州選出的議員卻擁有超過半數的票數可決定立法事項，肆無忌憚不公正地改劃國會選區以有利現任者，也被司法系統認為合乎憲法，而這個司法系統越來越充斥著受政治任命且帶有新保守派偏見的人。握有大權的機構，像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卻完全不受民主的控制。國際上的情況更糟糕，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這類機構無從究責，更別提民主控制了，而「非政府組織」（NGO）不論它們的行動有多麼善意，也是在沒有民主參與或監督下工作。

重提民主治理與經濟、政治和文化平等以及正義的要求，並沒有主張回到過去的黃金時代的意思，因為每個情況的意義都必須賦予新義以處理當下的條件和潛力。像聖保羅、約翰尼斯堡、上海、馬尼拉、舊金山、里茲、斯德哥爾摩和拉格斯等地的環境如此紛繁歧異，古代雅典的民主意義已與今天我們必須要賦予民主的意義沒什麼關係。但這裏令人驚嘆之處在於：正是遍及全球，從中國、巴西、阿根廷、臺灣、韓國到南非、伊朗、埃及，正在鬥爭中的東歐國家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都有團體和社會運動正集合起來行動，要求實現各自解釋的某種民主價值的改革。（註70）

美國領導人曾在相當多民眾的支持下自鳴得意地向舉世表明這個想法：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價值是放諸四海皆準、至高無上的，這些價值是文明的核心因而也是極關緊要的。全世界已能拒絕這種帝國主義的姿態，並把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反過來投進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心臟地帶：一套開放的民主的價值，一套致力於達成帶有經濟、政治和文化正義的社會平等的價值。（完）

註釋：

1. G.W.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April 13th,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2. Matthew Arnold is cited in R.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118.

3. A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eftTurn Magazine, No.12 Feb/March 2004.

4. N.Klei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The

Guardian, January 24, 2004, 18.

5 T.Crampton,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3, C5.

6 G.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th, 2002, p. A3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www.whitehouse.gov/nsc/nss.

7. J.Valdez,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8 G.Dumenil and D.Levy, “Neo-Liberal Dynamics: A New Phase?”

Unpublished MS, 2004, p.4. See also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p.3.

9 Ibid.

10 P. Armstrong, A.Glynn and J.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Long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11 Ibid.

12 The story of Thatcher’s path to neoliberalism is outlined in D.Yergin

and J.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13. L.Panitch and S. Gindin, “Global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forthcoming in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14 T.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Norton,1984), 217.

15 ibid, on PACs see 129-38; 235.

16 ibid, 235

17 L.Alvarez, “Britain says U.S. planned to seize oil in ’73 crisi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04.A6. On the Saudi agreement to recycle

petrodollars through the US see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18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N.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 Panitch and Gindin, op.cit.

20 The many debt crises of the 80s are covered extensively in Gowan,

op.cit.

21 Ibid.

22 G.Dumenil and D.Levy,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Unpublished MS, 2004.

23 D.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Why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6).

24 C.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5 Much of this was explored in the 1980s with the aid of “regulation

theory” - see R.Boyer, 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Une Analyse Cr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6).

26 G. Duménil and H.Levy, Economie Marxiste du Capit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R.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Gowan, op.cit.; R.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London: Verso, 2003).

27 Pollin, op.cit.

28 B.Fine, (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yon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London: Routledge, 2001).

29 It is hard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change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Asian Monitor coupled with reports in the

financial press allow some rough assessments to be made. Si-ming Li and

Wing-shing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D.Hale and L Hale,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82

No.6 (2003), 36-53. See H.McRae, “Working for the Yangtze dollar,” The

Independent Review, November 18, 2003, 2-3; K.Bradsher, “Is China the next

bubbl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04, Section 3, 1 and 9;

T.Crampton, “Asia’s rally defies most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1, 17; L.Uchitelle, L. “When the Chinese consumer is

k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2003, Week in Review, 5; K.Bradsher,

“Consumerism grows in China, with Beijing’s bless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03, C15; K.Bradsher, “China’s Strang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03, C5; J.Kahn, “China seen ready to conciliate

U.S. on trade and job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3, A1 and C2;

K.Bradsher, “Like Japan in the 1980’s, China Poses Big Economic

challeng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04, A1 and C2; T.Fishma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4, 2004, 24-51.

30 Wang Hui, edited by T Huters,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6.

31 Yasheng Hua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n Asian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Si-ming Li and Wing-shing Tang,

op.cit.; J.Kahn, “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Multinationals Succeed,

Two Decades Lat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03, Section 3, 1 and 10.

32 J.Khan, “China’s leaders manage class conflict carefull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Week in Review, 5; E.Eckholm, “Where Workers, Too, Rust,

Bitterness Boils Over,”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02, A4; E.Eckholm, “A

Ming Town’s Sullen Peace Masks the Bitter Legacy of China’s Labor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2002, International Section, 8;

E.Rosenthal,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03, International Section A8; J.Kahn, “Beijing Leaders

Populist Touch Is Not Felt by Most Rural Poo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2004, A5.

33 J.Kahn,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Jan 13, 2003, A1 and A8; H.French, “New Boomtowns Change Path of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04, A1 and A8.

34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Statement of Yasheng Huang,

“Is China Playing by the Rules? Free Trade, Fair Trade, and WTO

Compliance,” September 24, 2003,

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92403/huang.php

35 K.Bradsher, “G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04, W1 and 8.

36 Wang Hui, op.cit., p.53

37 M.Hart-Landsberg and P.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56, No.3.

38 Wang Hui, op.cit., pp.57-8

39 Yasheng Huang and Tarun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China Now,

April 3, 2004, http://www.chinanowmag.com/business/business.htm. See also

Yergin and Stanislaw, op.cit. chapters 8 and 10.

40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4).

41 The trend to increasing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U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 examined in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op.cit. The technical reports also contain pertinent comparative

information.

42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4.

43 A.Roy,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44 P.Dicken,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4th edition, 2003), chapter 13.

45 The importance of spreading risks through financial derivatives is

stressed in Panitch and Gindin, op.cit.

46 Gowan, op cit.

47 R.Wade and F.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The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

23.

48 J.Stedile, “Brazil’s Landless Battalions,” in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49 Roy, op.cit.

50 D.Rodrik,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1), p.9.

51 D.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89

52 Chandler, op.cit. p.230

53 T.Wallace, “NGO Dilemmas: Trojan Horses for Global Neoliber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202-219.對「非政府組織」的作用的全面觀察 見M.Edwards and D. Hulme (e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1995).

54 L.Gill, Teetering on the R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 J.Cowan, M-B Dembour and R.Wilson (eds), Culture and Right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6 A.Bartholomew and J. Breakspear, “Human Rights as Swords of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124-45.

57 Ibid, p.126

58 Chandler, op.cit, p.27; 218

59 Ibid, p.235

60 D.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forthcoming in R.Scholar (ed.) Divided Cities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61 Harvey, New Imperialism, op.cit.

62 Bartholomew and Breakspear, op.cit., p.140.

63 Wang Hui, op.cit. p.44.

64 R.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n.)

65 Chandler, op.cit. 223.

67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p.cit. chapter 4.

68 D.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12.

69 Task Force on American Democracy, op.cit. paints a devastating picture.

70例如，這是汪暉在上引的論述中國情況的文章中經常回復的論點。